

陈望道署名“平沙”的一组佚文

■陈启明

近阅民国旧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及《黎明》等刊物中,发现一组署名“平沙”的文章。根据文章的署名、陈望道与上述副刊的关系和文章的内容风格,可断定该组佚文出自陈望道手笔。

先看署名。“平沙”是陈望道在上世纪20年代用的一个笔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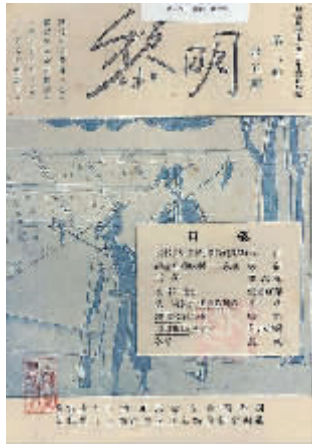
1926年8月,周作人在《语丝》第九十期发表题为“致陈望道先生书”的公开信:“望道先生:从友人处得知先生对于我攻击《改造》的闲话深致不满,有‘索隐’之举……我知道先生别字平沙,万一这平沙不是先生,那么恕我疏忽,取消上面的通信,只留下一个问候之意。”所谓“‘索隐’之举”,指署名“平沙”刊于同年7月《黎明》第三十六期的《语丝闲话索隐》。该文针对周作人在《语丝》第八十三期上的《我们的闲话》而发,对周氏远离《新青年》时期的信仰而鼓吹超脱隐逸的做法,进行了针对性的反驳。以公开信形式论争,周氏当确认此“平沙”即陈望道。

1928年10月,陈望道创办《大江》月刊,向时在日的茅盾写信约稿,得茅盾回信。其中一通题为“致平兄”,刊于当年12月《大江》月刊第三期。“平”字当来自陈望道笔名“平沙”。

再看陈望道与上述副刊的关系。

《觉悟》是《民国日报》副刊之一,1919年创刊于上海。1920年,陈望道应邀参加《觉悟》编辑工作。1921年8月,一向关心妇女问题的陈望道在《民国日报》创办另一副刊《妇女评论》并发表创刊宣言。1924年,他与刘大白一起编辑《黎明》周刊,并于1925年秋成立黎明社,主要成员皆为复旦师生,最初有陈望道、刘大白、徐蔚南、胡寄南、王世颖等。可见,陈望道与上述刊物的关系十分密切。

《寂寥》一诗发表于1921年《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二十一期,署名“平沙”。“我曾在这时,只身蹈雪,走了一百二十里,从义乌



青年时期的陈望道(1920年)及其创办的《大江》月刊、参与编辑的《黎明》杂志。

走向金华城西。那时并不知凄凉,寂寥,——难道因为热度未曾减低?又曾在这时,为探深寒,从东京迈往北方几千里。”诗中所叙“义乌”“金华”和“东京”之行迹,与陈望道本人经历相合。该诗当为陈望道作品。

刊于1921年《民国日报·觉悟》第二十七期的《诗与文体》,署名“平沙”。文章开篇便道:“我做了一首‘黄金’赠吾友大白先生,第二天某君来,说‘我不赞成诗含议论’。诗究竟可不可以含议论呢?”作者接着例举自己《作文法讲义》中的所有文体,和诗的内容加以对照,说明“诗尽可不限文体。换句话说,诗并不以文体而生好歹。所有好歹应该从别处去找差别”。作者直接引述自己著述,此为平沙即陈望道的又一有力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诗与文体》提及的“赠吾友大白先生”的《黄金》,是陈望道以笔名“平沙”刊于1921年《民国日报·平民》第二十二期的哲理诗。刘大白随即以“大白”笔名发表同题诗《黄金(二)——答吾友平沙先生》唱和,且刊

于《诗与文体》之后。陈素与刘交好,以新诗形式互相赠答,更可证明“吾友平沙”即陈望道。

陈望道以笔名“平沙”发表的文章还有:诗《人的声音》《无钱的姐姐》《言词底旨味》(分别刊于《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第十二卷第八期、第二十期,第十一卷第十三期),论文《“五卅”纪念》《谈滑稽》《我怀疑从夫主义底进步》(分别刊于《黎明》1926年第二十九期、第三十七期,1927年第二卷第五期)。

《人的声音》中写到“一切从生命的、从生命底核心喷发的、从生命底核心喷发了仍然有着生命的声音。从这声音,我才见着人底色彩,听到人底节奏,嗅出人底芳香。从这声音,我才相信‘真’于人间信有之,‘美’在人间不曾绝。”诗句充满着人性自由和真善美的气息。

《无钱的姐姐》写半夜街头卖身的底层妓女。诗分三小节,每节末句皆以“只是无钱的姐姐”作结,反复中包含着深切的同情。

《言词底旨味》针对“‘不好’的神异的尾音的旨味”和“峰峦般重叠着的‘赞美’的‘好的’的赞美

的旨味”,透现出陈望道对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意蕴的敏锐感受。

陈望道在上世纪20年代写过不少诗,由于散失,存世的不多。这些诗歌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陈望道早期的创作思想。《“五卅”纪念》是陈望道为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而作。他写道:“这样一个沸血的屈伏的纪念日,我想多说话远不如多静默的好。”“倘因这静默的一想,起了特种的义愤或民族的同感,竟把烈士的血做了自己的血,烈士的肉作了自己的肉,各随其分,沉挚地为我屈伏到了极点了的民族做点事,我中华民族的沉湎或者从此就可以有了救!”对英帝国主义企图以筑墙掩盖血案的做法极表愤慨,对民众发出呼唤:“除非我们的全民族站立起来,撤销了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和他们平等地讲话做事!国民呵,我们须要特别地纪念这一点!”“五卅”运动爆发后,陈望道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和代校务主任,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文即写于此一时期。

《谈滑稽》是陈望道阐释“滑稽”这一审美现象的论文。文中着重叙述了“滑稽”这种特殊审美体验:“上述情质和上述经历引起的滑稽感情,都是种特殊性的感情。中间藏有快感,也杂有不快之感。中间的快感就是准备伟大事象到来的紧张了的心,因为不意逢着渺小,随即轻松弛缓下去的一种愉快。”接着说明“滑稽中固然含有快感,另外还含有不快之感。那不快感底根据,就在于失望”。文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例证,比如《西游记》第七回孙行者在佛祖掌中打筋斗、《儒林外史》第二十回辛东之与季苇箫的对话等。此文与陈望道写作《美学概论》的时间极为接近,后者完成于1926年12月,其中有专论“滑稽”章节。由此也可看出他在此期间对美学相关问题的深入而持续的研究。

《我怀疑从夫主义底进步》探讨妇女问题,此文因刘大白发表于1926年《黎明》第二卷第二期的《从夫主义底进步》而起。刘氏“对于朱胡彬夏、杨袁昌英、王刘立明以及由周淑贞改作吴淑贞,郑婉卿改作王婉卿之类的现象”,主张用“新从夫主义说”说明它,“退一步讲,这些夫人们名字底出现,毕竟是一个进步”。陈望道则认为“朱胡彬夏等姓名的现象,只用旧说便可说明,不必另立新名的”,“不要因为看见她们装饰有些新花样了,就将她们作为新人物看待一样”。他认为,这些新花样并未改变男尊女卑的本质。当然,陈的说法迅即得到刘的呼应,该文文末即有刘大白以“汉胄”笔名所写的一篇附白,订正了自己的说法,对陈望道的观点加以肯定和支持。可见,陈望道对妇女问题的认识非常深刻,对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的批判极为坚决而彻底。

(上接第一版)

三

晓歌与《文汇报》文艺副刊及其历任主编多有联系,前有柯灵、唐弢,后有陈钦源、徐开奎。他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始于1938年9月17日刊于副刊《灯塔》的《三房客电气化起来》,终于1985年12月,长达五十余年,多达七十余篇,主要集中于上世纪40年代。上海解放后,晓歌从上海华东新闻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参军,仍在《文汇报》发表小说,如以人民解放军连长为主人公的《手表》(1949年12月20日)。《文汇报》老报人张香还当年曾在湖北孝感与刚分配来的晓歌等人在同一部队到大西南剿匪,他回忆道:“晓歌的笔是很健的,在行军间隙,还在为上海一份以进步著名的民营大报写稿。或者出之于友情的嘱托。”

从朝鲜战场回国退伍后,晓歌到山东高校工作,此后鲜见其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面世。但当年的文坛师友并未忘记他,在徐开奎等人的邀约下,晓歌的名字还是出现了。《文汇报》1956年10月迁回上海复刊后,晓歌发表了《蟠曲的松》(1956年12月1日),1957年发表《佳期》等。1958

年2月3日,他以小说《一床被子》获得征文三等奖,后与其他十篇小说汇编成《花果集》,由三位评奖者靳以、峻青、柯灵作序出版。1962年,晓歌再度以《车友》《配角》等亮相。新时期后,晓歌发表书评《散文的联想力》(1985年12月23日),评论徐开奎的散文新著《雕塑家传奇》。

这种作者与编者的亲密关系,并未因时代变迁人事沉浮而移易。1987年7月22日,陈钦源逝世,晓歌在给徐开奎的信中有大段回忆:

钦源讣告收到之日,已是追悼会的第二天了。心中很难过,但又无可作为……我总觉得84年我回沪那次我与他还有许多话没谈完。我劝他,年纪这么大了,别每天挤电车上报馆了,要挤出事的。他说他和报馆有深厚感情,离不开它……哪知此情此景竟成永诀……恕我不再写下去了。

四

1980年代,晓歌曾尝试重拾旧业写作小说,中篇小说《赌场·魔鬼·地狱》经徐开奎引荐发表在《小说界》1985年第二期。他在致编辑左泥的信中,谈到准备创作以旧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设想,“我正在

写的一部小说,拟题为《上海滩的沙砾》,以旧上海日伪统治时期底层人民所受煎熬与苦难为题材,陆续打好了前几章的腹稿,先写出了其中第二章《赌场内外》……至于以后各章尚在构思之中,打算考虑成熟一章写一章。好在其总结结构的设计上多少有点‘系列’性质,连接起来是长篇,分别来看也各成中篇。”但他的写作计划最终并未完成。

为此,晓歌在给徐开奎的信中透露出他的遗憾和无奈:“鉴于当前出版界和文艺界的种种情况,我也不大有写作的情绪了。”“就谈不上练笔或写作了,尽管自己感到还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是‘布衾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实际上已是‘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心态了。”

晓歌本来有机会出版早年的作品集。1980年代初,长期被忽视的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开始得到重视。以巴金任名誉主编,林淡秋、楼适夷、柯灵、朱雯为主编的编委会,曾编选出版一套五辑50种以上海地区作家作品为主的个人专辑,即《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其中就有晓歌的《迎曦集》。他为此特地来沪寻找资料确定篇目。由于经济等原因,50种作家专辑未全部出版,其中包括

晓歌的作品集。

2002年6月出版的八卷本《上海四十年文学作品系列》丛书,收录了晓歌的小说《狗坟》《戳夫》《骷髏杯》、散文《万弦琴》、报告文学《渡长江》。该书名誉主编柯灵在编选作品时提出,有些人的作品从未结集出版,如林莽、陈钦源、晓歌,可多选一些。柯灵的关怀让已淡出文坛的晓歌大为感动,他在2000年12月31日致徐开奎的信中写道:“读到(沈寂《最后的教导》)这段记载时,我早已干涸的泪泉竟湿润了。我感奋的不单是多收入几篇作品,更感激柯灵老师对我这落伍小卒的挂念。”

晚年的晓歌自称为“落伍小卒”,逐渐减少了与文坛师友的联系。他在1988年的一封信中就与柯灵通信事写道:“此后我也没再去信,用意还是在不打扰他,他写信很及时与认真,我们当然不忍心在这些方面让他虚掷时间。”董鼎山在1996年回忆:“我们青年时期的同行,有的做了外交官(王殊),有的已销声灭迹,不知去向(晓歌)。我当时最佩服的散文作家晓歌,连何为也不知他的行踪。”晓歌与徐开奎的通信则保持到2000年底,但内容已是彼此的晚年生活和身体状况。